

去年10月,上海辞书出版社新印上海博物馆藏《淳化阁帖》潘祖纯跋本,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。

《淳化阁帖》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丛帖。宋初,太宗赵光义命翰林侍书王著甄选内府所藏历代帝王、名臣、书家等墨迹作品,于淳化三年(992)摹勒刊刻。

遗憾的是,《淳化阁帖》祖本早在北宋就已毁佚,至今未见可信的祖本传世。但值得庆幸的是,历代翻刻此帖却蔚然成风,留下了不少“嫡子嫡孙”。据文献记载,仅宋代的翻刻本就多达数十种之多,但其中绝大多数业已失传,今日尚能得见的《阁帖》宋刻宋拓本仅有:安思远藏本四卷(现藏上博),懋勤殿藏本十卷(现藏北京故宫),潘祖纯跋本十卷(现藏上博)、泉州本残卷一册(现藏香港中大)、绍兴国子监本卷九(现藏上图)、绍兴国子监本卷一至卷八及卷十(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)、泉州本莊夏刻本十卷(现藏上图)、泉州本莊夏刻本十卷(现藏国博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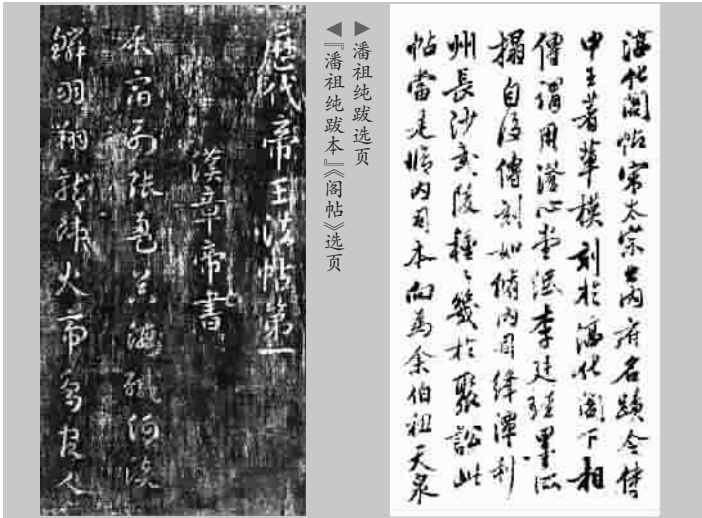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诸本均久负盛名,其中身价最高者当属安思远藏本四卷,以其2003年450万美金的成交价而成为碑帖收藏界的美谈。名实相副者当属绍兴国子监本,以其能见诸宋代文献记载,历代流传最为有绪。艺术欣赏效果最佳者当属潘祖纯跋本和懋勤殿藏本(两本出自同一底本),以其刊刻精良,修订严谨而著称。香港中大所藏“泉州本”书刻堪称一流,出身高贵,但残存一册,只能屈居在后。

上海辞书出版社此次影印的《宋搨淳化阁帖》为“潘祖纯跋本”,此套宋拓《阁帖》十卷经明代天泉翁(潘祖纯伯祖)、潘凤洲(潘祖纯伯父)、潘祖纯,清代卓蔗老、梁国治、李宗瀚、李联琇、李鸿煌,现代许福禺等人递藏,现藏上海博物馆。

此本宋代流传情况不详,明代祕藏于潘氏家族,入清后,册中留下查升(声山)为卓蔗老题跋,旋归东阁大学士梁国治,最终转归碑帖收藏者大家李宗瀚,宗瀚为之题签,其后一直祕藏李家,至宣统元年(1909)经李鸿煌手石印传布于世。民国二十四年(1935),许福禺又用珂罗版印行,以上两种印本流传极为稀少,现已难得一见。

此帖究竟是宋代何种《阁帖》,过去曾一度传为“修内司本”,但终究缺失有效证据,难以令人信服。此帖何人何时刊刻,可能将成为千古之谜。又因帖尾存万历三十四年(1606)六月潘祖纯题跋,故呼之为“潘祖纯跋本”。

“潘祖纯跋本”与安思远藏本、南宋绍兴国子监本等宋拓本刊刻手法、刊刻底本均不相同,但却与故宫“懋勤殿藏本”完全相同,确系同出一石。“懋勤殿藏本”拓制时间虽稍早于“潘祖纯跋本”,但有缺文,而“潘祖纯跋



本”则无补无缺。

笔者认为“潘祖纯跋本”是传世较佳的《阁帖》修缮本,刊刻传拓皆精细无比,又将《阁帖》祖本的刊刻失误有所更正修订,且笔法墨趣得以突现,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。因其刊刻精湛,谬误较少,书法欣赏效果极佳,前些年还有个别学者推测“潘祖纯跋本”可能就是《阁帖》祖本。

笔者不同意以其刊刻质量高超就推定为《阁帖》枣木祖本的观点,好在这一观点终止于2006年,因为当年“潘祖纯跋本”的底本——南宋刻石在杭州重新发现。

杭州孤山浙江图书馆大院西侧碑廊内存有一套《淳化阁帖》刻石,因仅存残石二十余块,其版本过去一直无法识别,一般多视为明清刻石别本。2004年春,笔者携《肃府本》前往对照研究,亦无果而返。2006年,故宫博物院新印《懋勤殿本淳化阁帖》的面世,提供了新的校勘的样本,最终使这套刻石的身份得以确定,它就是“懋勤殿藏本”和“潘祖纯跋本”所出的原石。

经笔者统计,浙江图书馆现藏《淳化阁帖》刻石25块(46面),保存了《淳化阁帖》原本的五分之三强。此套《淳化阁帖》刻石究竟是宋代什么刻本?

据文献记载,宋代刊刻《淳化阁帖》有数十套之多,如今要确定它是其中哪一套,有一定难度。但可以推断的是此帖必然刻于浙江杭州,因为如此众多、笨重的帖石从它处移到杭州的可能性不大。其次,此套帖石可能私刻而非官刻,理由是:此帖存在同一面颠倒刊刻的情况(一卷内容刊刻结束,其后尚有余石,就颠倒刊刻他卷内容),比较节约石材。同时,双面刻石文字有的正反颠倒,但也有的是不颠倒,刊刻体例不够统一严谨,这些多是私刻法帖特征。

基于帖石刊刻在杭州又属私刻,笔者初步推断为“世綵堂本”,刻于宋度宗咸淳间(1265—1274),系贾似道门客刻帖高手廖莹中摹刻,因置于世綵堂而得名。据传贾似道门客廖莹中精于摹勒,王用和工于镌刻,曾令翻刻,故“世綵堂本”亦属“贾刻本”体系。如今我们从“懋勤殿藏本”和“潘祖纯跋本”中流露出高超的刊刻艺术成就来看,此帖出自贾似道、廖莹中之手的推测,仿佛是最为合情合理之事。但笔者最终还是不敢摘去“潘祖纯跋本”的帽子,而直呼为“世綵堂本”,留点悬念和未知,让后人将《阁帖》佳话来延续,未尝不是一件美事。

上海辞书出版社此次重新影印“潘祖纯跋本”,既提供了一个《阁帖》最佳、最全的书法样本,泽惠书坛艺林,又能为《阁帖》版本研究提供宋拓资料,尤其是与“懋勤殿藏本”的校勘带来条件,同时还能为进一步论证杭州南宋《阁帖》刻石身份打开方便之门。笔者希望“潘祖纯跋本”的出版,能够带动《阁帖》的研究与出版事业长足发展。

## 武肃王钱镠逸事

◆ 钱汉东

钱镠(852—932年)是我国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立人,死后葬于临安。钱镠为构建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的格局奠定了基础,为初步形成鲜明的江南水乡特色作出了贡献,他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开创者。今年是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诞辰1160年,逝世1080年,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实在是值得纪念的。

五代十国,被宋代史学家称为“乱斯极矣”,军阀纷争,割地自雄,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唯有吴越国王钱镠独具远见卓识,尊重人才,礼贤下士,采取了“保境安民、发展农商”之明智策略,征用民工,修建钱塘江海塘,又在太湖流域,普造堰闸,以时蓄洪,不畏旱涝,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,上海闸北区的走马塘,原名钱溪。这些有利于地区的农业经济,使吴越国的百姓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。当时吴越国已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财富,由此也奠定了长三角地区经济一直领跑全国的历史基础。

### 宁留西湖,勿求千秋

北宋欧阳修曾说:“独钱塘自五代时,知尊中国,效臣顺,及其亡也,顿首请命,不烦干戈,令其民幸富完安乐。”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47年11月30日应浙江省教育会等邀请,在浙江民众教育馆作题为《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》的讲演,他指出:“唐末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、四方鼎沸的时代,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,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;两浙既然是当时唯一的乐土,因而杭州就成了乐土中的天堂;乐土中的天堂,其繁雄富盛,自非复其他兵乱之余的都会所可比拟了。北宋时杭州有‘东南第一州’之誉,绝非过当。”此言极为精辟,道出了钱镠在杭州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。

钱镠平息战乱后,维护地方安宁,建立吴越国王,定都杭州。今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西湖附近,在当时只是一片沼泽地,农民开垦的田地常遭水患,加上政局动荡,民不聊生。907年至932年钱镠在位期间,他对杭州先后进行3次扩建,大大拓宽了杭州城的范围,城垣留下的“百井坊巷”,原来有井九十九眼,就是钱王开凿的,故俗称“钱王井”。钱镠同时发展经济,扶植农商,将杭州建成了“富甲一方”的“人间天堂”。据史料记载,隋末唐初杭州户籍仅15380户,至五代吴越盛时人口激增至10万余家、50万人,增速之快,为其他九国所难以企及。

千年来,秀丽俊美的西湖,为杭州增添了多少灵动的风姿,又有多少骚人墨客为之倾倒。湖光山色,璀璨夺目。春的感伤、夏的灿烂,秋的浓艳、冬的孤独,实在是天下游人向往之地。苏子瞻诗云: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他把西湖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,成为千古绝唱。

但世人也许有所不知,正是钱王的仁慈和贤明,才使西湖化解了一次“千年之劫”,得以保全至今。据传,当时中央政府准许钱镠造一座王府,风水先生认定填了西湖造王府,是最佳选址,这里风水好,有王气,钱家可享受千年江山,但钱镠坚决不同意,说:“百姓靠湖水为生,无水即无民,我还要王气干什么?”他不但没填西湖,还设置了7000名“撩浅军”,专门从事西湖的疏浚工作,以保持西湖水域的清澈,后人“留得西湖翠浪翻”的诗句赞扬他。

原本对此说我心存疑惑,甚至认为很可能是好事者的杜撰。后来读了明末清初文学家、史学家张岱的《西湖梦寻·钱王祠》时,才知道这则故事是有出处的。张岱是位严谨的学问大家,他的话是比较靠得住的。他写道:“时将筑宫殿,望气者言:‘因故府大之,不过百年;填西湖之半,可得千年。’武肃笑曰:‘焉有千年而其中不出真主者乎?奈何困吾民为!’”这话令人感慨,这才是真正的“以民为本”啊!后人为纪念钱王,在西湖边上建起了钱王祠,并撰文书碑,颂扬功德。

宋代之后,凡是在杭州做过官的,无不对钱王赞颂备至。表忠观始建于北宋元丰二年(1079年),表彰五代吴越国王钱氏。清代以后称钱王祠,康熙、乾隆二帝在此留有“保障江山”和“忠顺遗床”等御题。西湖十景之一的“钱祠表忠”,表明杭州百姓对于钱王功德的永世不忘。钱王祠内有苏东坡所写的《表忠观碑记》,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碑,我年轻时曾临摹过。碑文叙述了吴越国三代钱王在天下大乱、民不聊生的五代时期,消弭兵戈,让百姓安居乐业,最终纳土归宋的事迹。《表忠观碑记》云:“天下大乱,豪杰蜂起,方是时,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,既覆其族,延及于无辜之民,罔有孑遗。而吴越地方千里,带甲十万,铸山煮海,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,然终不失臣节,贡献相于道。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,四时嬉游,歌舞之声相间,至于今不废。其有德于斯民甚厚。”表达了杭州百姓对钱王不谋私利,保全西湖,怀有永远的感恩之心。

### 善事中国,纳土归宋

吴越国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,加上经济实力雄厚,迫使四周邻国不敢贸然进攻,从而得以在吴越国实现跨越式经济发展,



五代钱弘俶造银阿育王塔雷峰塔出土

这在封建社会实属罕见。别人劝钱镠称帝,但他一生崇尚祖国和平统一,屡次拒绝,坚决不搞“吴越独”,坚持不做老大。在钱镠72岁那年,农民将得到传国玺献给钱王,钱镠看后道:“此天子所用之宝,非臣下所宜留。”乃上表献于朝廷,恪守臣礼。他甚至在临终时还嘱咐儿子钱璠:“子孙善事中国,勿以易姓废大事之礼。”坚守“事奉中原,终不失臣节”方针,不局限效忠于某一姓氏,并一再以此教育子孙。

北宋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对钱镠“善事中国”的政策给予高度评价评介:“钱镠所立家训,乃至临终遗嘱,念念不忘要善事中国,勿以易姓废大事之礼。”在军阀混战割据的局势下,吴越国富庶甲于东南,钱镠在治理杭州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,其重要的精神支柱



▲ 钱镠像

就是代代钱王都奉行“信佛顺天”的宗旨,信奉佛教,以教化民众,顺应自然规律,以应对时局变化。

宋开宝八年(975年),宋太祖赵匡胤最后消灭了割据国南唐,十国之中只剩下吴越国。高僧延寿乃德韶之法嗣,此时沉疴在身。吴越王钱弘俶前往探病时,对宋灭南唐危及吴越走向,征询延寿的意见,延寿则尽力劝谕钱弘俶“纳土归宋,舍别归总”。

钱弘俶审时度势,遵循祖宗武肃王钱镠的遗训,以天下苍生安危为念,采纳了延寿临终遗言,为保一方生民,采取“重民轻土”之善举,毅然于太平兴国三年(978年)五月入宋京开封,尽献十三州之土,归降宋朝,使宋王朝兵不血刃,成就了一段顾全大局,中华一统的历史佳话。千年前的古人具有如此的历史远见和宏大胸怀,实属不易。

宋太祖对钱弘俶归降,礼遇颇周,盛情款待,赏赐甚多,并封其为“淮海国王”,仍任“天下兵马大元帅”。两月后遣返,临行时,宋太祖赐钱弘俶密封黄色包袱一个,嘱咐他路上秘密拆开。钱弘俶于途中拆开一看,其中都是群臣要求扣留钱弘俶的奏章,他返杭后造保俶塔,还愿以报佛恩,同时上奏朝廷以天下既平,请免去大元帅之职;宋太祖又封钱弘俶为“汉南国王”等。钱弘俶念及祖上遗训、高僧延寿的“舍弃别立”劝谕,又奏准辞去“国号”。从此,钱家人过起了“耕读传家”的平民生活,子孙也无祸患,平安地繁衍生息,血脉相承。

由此可见,钱镠以自己的思想、行为、方略和业绩,使吴越国避凶趋吉,转危为安,“世方喋血以事干戈,我且闭关而修蚕织”。钱镠深明大义、高瞻远瞩,他“善事中国,保障安民”的立国方针,使他统治的地区在战乱中获得了建设的长足发展,在国家四分五裂之时,维护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和本地域文化的一枝独秀。

钱镠渴望和平统一思想的缘由:少年时代饱尝战乱,企盼和平;他从军的初衷是为了保卫家乡,升迁后以天下和平统一为己任;他受到家庭的影响,主张和平,低调从事。钱镠为江南奠定了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的物质基础,也为南宋小朝廷定都临安,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。至今,杭州许许多多美丽的传说故事都与这位吴越王联系在一起。

五代十国割据时期,大梁等五代政权更迭不断,最长才存续16年,最短10年不到就一命呜呼。虽占据中原一隅疆土,自顾不暇,朝不保夕,难成气候。其余十国,更是羸弱不堪。唯有吴越国,割据一方,依靠钱镠的雄才大略,崛起于乱世之中,造福于子孙后代。钱王纳土归宋后,留给后人的是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的美丽江南城市。